

中国经典宝库



诗经

朴素的歌声

杨天宇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中国经典宝库



诗经

朴素的歌声

杨天宇 著

本丛书由原出版者香港中华书局合法授权予本社出版

中国经典宝库

诗经：朴素的歌声

杨天宇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插页 5 印张 6.375 字数 127,000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
印数：13,001—18,000

ISBN 7-5325-2191-5

B·273 定价：10.10 元

主 编 的 话

十三经对今天的不少年轻人来说是有些陌生的,可是在古代这却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。汉代开始,由于儒家地位的提高,那些最能代表儒家精神的典籍,便被尊为经典,经过唐、宋两代的补充,便形成了以《诗》(《诗经》)、《书》(《尚书》)、《易》(《周易》)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孟子》等为内容的十三经。这十三种经典虽然都属于儒家的早期著作,但是由于它们代表着儒家核心的思想观点和文化结晶,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,其生命力却历久弥新。这些特点是:

一、历史悠久。十三经中多数著作的确切撰著或成书时代无法考定,可大致能够肯定的是均出现于周代至秦汉之间,时间距今都是两千年以上了。这是中国用文字记载的典籍中早期成果的精华,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。今人想要溯流追源,那是定要阅读十三经的。

二、内容丰富。十三经的内容各有侧重,有对自然现象的观察,有对社会秩序的叙述,有对历史事件的记载,有对民间文学的汇编,有对历史人物言行的实录,可以说汇含了古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,其涵盖面是极为宽广的。

三、影响巨大。两千多年来,中国读书人都将十三经作为治学、立身、处世的思想知识渊藪来看待,它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道德准则,早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、所有角落,它的宇宙观、人生观、哲学观、政治观、道德观、伦理观、文学观、历史观、宗法观、价值观等等观念,已经融化为中华民族的灵魂,渗入到中国国民的血液中,从而构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、民族文化。

有人曾说,五千年中华灿烂文化的载体,主要是由十三经、诸子百家著述、二十四史和一些优秀文学著作组成的,这话很有道理。我们今天所讲的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,主要也是指从上述各类典籍中汲取精华,去除糟粕。这些典籍特别是十三经,实在是一座座无尽的宝藏,足以提供给我们多方面的助益:

一、思想道德的资助。十三经所包容的思想道德观念广博而深刻,它的“天人合一”的世界观,能够启发人们很好地调节人和自然的关系,从而适应并改造人类的生存环境。它以尧、舜、文、武为楷模,主张德治和仁政,崇尚礼乐和仁义,倡导民本思想。在伦理道德上注重“五常”(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),借以维护社会秩序,处理人际关系。在自我修养上则主张磨炼人格意识,坚定言行操守,“贫贱不能移,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,“匹夫不可夺

志”，进而提出了一整套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论规范。举凡传统儒家的哲学、政治、伦理、经济、文化等观点，无不融汇其中。而且，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之后，历经汉、宋、明、清各代儒生的笺注解释，这种儒家思想更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充实和发展，始终占据着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，上自皇室贵族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大都以此作为规范自己思想行为的准则。因此，十三经堪称传统文化的宝库。

二、历史知识的丰富。十三经中各经的成书时代有先有后，著述时间跨越数百年；而所记述内容的时域又包容夏、商、周三代，兼及秦汉，长达两千余年。在这漫长历史期间的朝代更迭、帝王轮替、礼仪典章、战争攻伐、辞说外交、学术争鸣、文学创作、文物器具等等，无不在十三经中有所记载。通过这些古代文献所提供的可靠史料，我们可以认识那数千年历史的概貌，知道我们民族之所由来。同时，它所形成的典故，也供给我们广博的知识。

三、语言文字的培养。用古代语文著述的十三经，固然因其简古而索解为难，韩愈说《尚书》是：“周《诰》殷《盘》，诘屈聱牙”（《进学解》）；不过，十三经中却也有专门关于文字知识的一经——《尔雅》，它围绕着其他典籍对古文字作了解释，使我们得以了解有关字词的古义，读懂其他各经，并了解汉字的由来和演变。更何况，《诗经》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在当时就被视为学习语言的教科书，孔子曾说过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它所建造的美文学殿堂，给历代的文学发展以滋养。《春秋左氏传》虽属史书，却也是文字简洁、气势磅礴的古

代优秀散文。《孟子》一书记载了孟轲及其弟子们的谈话，可它所表现的思辨与逻辑力量简直是无与伦比的，而且简明通俗、亲切动人，确为美轮美奂的散文。阅读十三经，当会增加我们的语言文字知识和增强文字表达能力。

十三经自是一座开掘不尽的文化宝藏，它必将裨助中国新文化的健康发展。而《中国经典宝库》对这座宝藏作了初步的介绍，以供深入宝藏的朋友们做点前期准备。还望读书界的朋友提出批评性意见。

魏同贤

乙亥新春于沪寓

前 言

【一】

在人们通常所说的“四书五经”或“十三经”中,《诗经》是最早被中国古代统治者尊奉为经的一部儒家典籍。

在《诗经》被尊奉为经以前,它的名字只叫做《诗》。《论语》和《墨子》所说的“《诗》三百”,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以及先秦诸子书中所谓“《诗》曰”或“《诗》云”,指的都是《诗经》。

西汉时期,统治者提倡儒术,先后把儒家的《诗》和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等五部典籍尊奉为经,于是这五部典籍都有了“经”名,这就是所谓“五经”。其中《诗》最早在汉文帝时候就被尊为经了,而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都是在汉武帝的时候才被确立为经的。西汉统治者挑选研究这些经的知名学者立为博士官(即所谓学官),让他们招收弟子进行教授,这样“五经”就在汉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。

《诗经》本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诗歌选集,其中收集了

上从西周初年，下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。这些诗歌根据音乐性质的不同，划分为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三大类。《风》又称为《国风》，所收集的是一些地方民歌，共一百六十篇，作者多是一些不知名的民间歌手。这些民歌分别来源于当时的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卫、王、郑、齐、魏、唐、秦、陈、桧、曹、豳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，因此被划分为十五《国风》。“雅”是正的意思。“雅乐”就是“正声”或“正乐”，这是宫廷和贵族用的音乐。《雅》中所收集的诗，就是配合“雅乐”演唱的诗，这些诗主要是当时贵族士大夫的作品，共一百零五篇。雅乐有新旧两种。旧有的雅乐比较纯正，称为“大雅”。后来又有一些受了地方民歌影响而“杂以《风》之体”的新的雅乐出现，被称为“小雅”。因此《雅》诗也被区分为《大雅》和《小雅》两类，《大雅》三十二篇，《小雅》七十四篇。“颂”本是一种用大钟伴奏、可以边舞边唱的庙堂音乐，配合这种音乐的诗，就称为《颂》诗。《颂》诗共四十篇，都是官僚贵族制作的。《颂》诗又分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三类。《周颂》三十一篇，是西周王室庙堂祭祀的乐歌。《鲁颂》四篇，是春秋时期鲁国宗庙祭祀的乐歌。《商颂》五篇，是宋国宗庙祭祀的乐歌；因为宋国的统治者是商的后裔，所以不叫《宋颂》而叫《商颂》。

汉代研究和传授《诗经》的学者主要有鲁、齐、韩、毛四家，因此《诗经》有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、《毛诗》之分。《鲁诗》最初的大师是鲁人申培（人称申公）。《齐诗》最初的大师是齐人轅固。《韩诗》最初的大师是燕人韩婴。《鲁诗》和《韩诗》在汉文帝时就立了学官。《齐诗》在

汉景帝时立了学官。这三家《诗经》传授时的本子都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即隶书写的，所以被称为今文经。这三家学者对于《诗经》的研究和解说，便被称为今文《诗经》学或今文《诗》说。

《毛诗》最初的大师是鲁人毛亨，人称大毛公。毛亨给《诗经》作的注解，名为《毛诗故训传》，简称《毛传》。毛亨传授给赵人毛萼，人称小毛公。河间献王刘德立毛萼为博士，并把《毛诗》献给汉朝廷，但朝廷没立学官，《毛诗》只能在民间流传。《毛诗》最初发现时的本子是用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写的，所以被称为古文经。《毛诗》按其篇目一共有三百一十一篇，但其中六篇仅有题目而无诗文（据说诗文已经亡佚了），所以实际有诗仍然是三百零五篇。《毛诗》还有《序》。在《毛诗》每篇诗文前面，都有一句或若干句简短的文字，以提示该篇的诗义，有的还述及产生的背景，叫做《小序》。在《毛诗》的第一篇《关雎》的前面除《小序》外，还有一段总结三百篇创作经验和阐述儒家诗歌理论的文字，叫做《大序》。

三家《诗》和《毛诗》，虽因文字今古的不同而得今文经、古文经之名，但这种区别是次要的，而且《毛诗》在后来流传时也被改写成今文（隶书）了。它们实际是因学统不同、治学的方法不同、对诗的文字和诗义的解释不同而划分的两个不同的学术派别。汉代形成的今古文两大派别的经学，被后人称为汉学。

今文三家《诗》盛行于西汉，到东汉虽仍被朝廷立学官，但已经逐渐衰落了。《齐诗》在曹魏的时候就亡了。到西晋时期，《鲁诗》也亡了；《韩诗》虽存，已经没有人传

习了。南宋以后,《韩诗》也亡了,现在仅存《韩诗外传》,也已经不是汉时的原貌了。相反,古文《毛诗》在西汉虽不被重视,到东汉却盛行起来。当时著名的学者如郑众、贾逵、马融、郑玄等都研治《毛诗》。郑玄还为《毛传》作《笺》(也是注解的意思)。郑玄的《笺》虽以解释《毛传》为主,却杂采三家今文《诗》说之长,形成了混淆今古文家法的“通学派”,盛行一时。经过郑玄作《笺》的《毛诗》,对今文三家《诗》取得了压倒优势。三家《诗》衰亡后,《毛诗》独传后世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《诗经》,就是郑《笺》本的《毛诗》。

【二】

《诗经》本是文学作品。但中国古代统治者几乎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文学作品对待过。《诗经》从周代开始,就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典礼仪式、贵族宴会、政治和外交等场合,并被作为贵族学习的教材。孔子说: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?《诗》可以兴(对人的思想和感情起启发、激发和移化的作用),可以观(有认识作用),可以群(有沟通人的思想感情的作用),可以怨(有讽刺、批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的作用)。迩(近)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鸟兽草木之名。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孔子的话,正是对《诗》在周代所起社会作用的概括,也反映了儒家对《诗》的社会作用的想法。

自从汉代把《诗经》尊奉为经以后,这部儒家典籍便成了钦定的政治伦理教科书。汉统治者需要巩固其一统

天下和皇权，于是便有鼓吹“大一统”和“君权神授”、附会阴阳五行和谶纬迷信的今文经学出现。当时的今文经学最盛行的就是《春秋》公羊学和三家《诗经》学。但由于今文经学竞相附会、日趋繁琐化和神秘化，致使学者不得要领，甚至皓首不能穷经，这样发展到东汉中后期，已经不能很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了，“通训诂，明大义”，简明易学的古文经学便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盛行起来，于是三家《诗》衰落了，出现了《毛诗》独盛的局面。

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随着国家的动乱、分裂，旧有的统治秩序的破坏，加上玄学的兴起，继而佛教的盛行，于是经学进入了衰落时期。这时的经学仍属汉学系，但汉学中的今文经学已衰微，今古文经学的斗争被古文经学的内部斗争所取代。这种斗争大体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魏晋时期，主要是郑学和王学的斗争。郑玄打破今古文家法，兼采三家《诗》说以为《毛诗》作《笺》，称为郑学。王肃则标榜纯粹的古文经学，他为《毛诗》作《注》，排斥三家《诗》说而纯用古文说，并攻击郑玄破坏今古文家法。曹魏皇帝支持郑学，司马氏支持王学。随着司马氏在政治上的得势，王学曾一度盛行，但西晋灭亡，王学很快也就失势了。第二阶段，南北朝时期，由于国家的分裂，经学也分裂为南学和北学。北学的《诗经》学墨守郑《笺》，无所创新。南学的《诗经》学则较自由，虽以郑《笺》为本，亦兼采王学和魏晋以来的玄学。隋灭陈统一天下，南、北学也归于统一。但“天下统一，南并于北，而经学统一，反北并于南”（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七）。这是因为南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注意吸取新的营养，能有所创新，

代表了学术发展的主流，也更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。

唐朝建立后，为加强思想统治，虽儒、佛、道并用，也仍以儒家经学为主。但自汉以来，经学内部有今古文之争，有郑学与王学之争，又有南学和北学之争，众说纷纭，义疏繁杂，各家所据经书在文字上也互有出入，这就使人们莫衷一是，不利于国家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。于是唐初统治者下令，组织学者订正五经文字，撰成《五经定本》，又据《定本》撰成《五经正义》，以统一各家经说。其中《毛诗正义》七十卷，以郑《笺》本《毛诗》为底本，广泛吸收汉魏六朝以来《诗经》学研究的成果，对《毛诗》和《传》、《笺》做了详尽的疏解，是一部汉学《诗经》学的集大成著作。《毛诗正义》被唐朝颁行全国，成为学童、士人和官吏人人诵习的标准读本，并使《诗经》在全国得到空前广泛的流传。

《毛诗正义》既是汉学《诗经》学的集大成的著作，但也标志着汉学《诗经》学的终结。因为统治者把它的经文、训诂和疏解规定为唯一标准，不能有所出入，一字一义皆不可变更，这就停止了《诗经》的自由研究，汉学的《诗经》学也就成为僵化而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东西了。所以到宋王朝建立后，充满怀疑精神、主张自由思考的宋学的《诗经》学，便破坏并进而取代了丧失生命力的汉学的《诗经》学。宋学《诗经》学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，就是南宋的朱熹。朱熹在哲学上发展二程（程颢、程颐兄弟）的思想而建立了理学（即道学）体系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在于把封建秩序说成是永恒天理的化身。在《诗经》学上，他竭力攻击《毛序》，认为“《诗序》实不足信”（《朱子语

类》卷八十),主张废《序》言《诗》,说“尽去《小序》,便可自通”,“尽涤旧说,《诗》意方活”(同上)。朱熹在他的《诗经》学力作《诗集传》中,就弃《诗序》而不录,集宋学《诗经》学之大成而作了新解,并把他的理学思想贯串其中。此后朱熹的理学被统治者确定为官方哲学,《诗集传》则成了解释《诗经》的权威性著作。宋学的《诗经》学压倒汉《诗》学而取得了统治的地位。这一统治地位从南宋末延续到元、明,直到清初还有很大影响。

宋学尚思辨和独立思考,其末流则日趋空疏和僵化,变成了只知空谈义理心性而不务实际的无根之学,因此到明清之际,便走向衰落。相应地,宋学的《诗经》学也丧失了它的统治地位。清初以后,取代宋学的,是主张实证的汉学的复兴,称为新汉学。在《诗经》学方面,先是东汉毛、郑古文《诗经》学的复兴,后来是西汉今文三家《诗经》学的复兴。

清初学者如顾炎武等主张对经书作实事求是的切实研究,以期经世致用。他们认为汉代距先秦较近,其经说比较接近古人的本意,所以他们要求“复古”以“求真”,即主张对被宋学排斥的汉学进行学习和研究,研究的方法则是重考据和实证,从而开创了清代的考据学(朴学)。另一方面,清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高压恐怖政策,使知识分子不敢谈政治,同时清统治者又用利禄引诱和网罗学者去从事大规模的古籍整理、校勘和编纂工作,以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,这种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,使许多知识分子脱离现实而钻进了故纸堆,造成了考据学的发展。考据学在乾、嘉时期达到鼎盛,而在道光以后走向衰

落。考据学派主要是复兴和研究东汉的古文经学,在《诗经》学方面主要是研治《毛诗》学,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著作。如清初陈启源积十四年心血、三易其稿撰成的《毛诗稽古篇》,旗帜鲜明地标明以《毛诗》为宗,“诠释经旨,一准《毛传》”(《四库提要》),而把辨正和抨击的矛头指向宋《诗》学,清初学者提倡实学,批判宋学,“此编尤其最著”(同上)。乾嘉时期,惠栋的《毛诗古义》,焦循的《毛诗地理释》、《毛诗补疏》,戴震的《毛郑诗考证》等等,都是考据学的重要著作。道、咸以后,考据学虽走向衰落,但仍有一些认真治学且很有成就的古文学者,他们接受了乾、嘉学者考据的成果,对《诗经》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疏释。其中最重要的学者和著作,有马瑞辰的《毛诗传笺通释》、胡承珙的《毛诗后笺》和陈奂的《诗毛氏传疏》。

在考据学盛行的乾、嘉时期,就有一些学者不满意这种脱离现实的繁琐考据的学风,而开始研究今文经学。道光以后,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危机,内忧外患,清代的今文经学派则站到了思想运动的前哨。汉代的今文经学喜谈“微言大义”,正便于他们利用来“托古改制”,探索改良社会的方案。例如龚自珍把汉代《春秋》公羊学派所发挥的“三世三统”说,运用到《诗经》学中,利用《大雅》中的几篇记述周人开国历史的诗和《周颂》中的几篇诗,来宣传历史的发展由乱而治,要经过“据乱世”、“升平世”以达到“太平世”的社会进化论(《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二》)。但因为汉代的今文《诗经》学早已衰亡,只有片言只语散见于古代的各种典籍中,于是又兴起了对三家《诗》的辑佚

工作。其实这种工作从南宋时的王应麟即已开其先河，明清都继续有学者在做，而自道、咸以后，为了提倡三家诗来反对《毛诗》，这门学问便兴盛起来。陈寿祺、陈乔枏父子的《三家诗遗说考》，已经遍搜古书。清末民初的王先谦又集前人辑佚成果之大成，撰成《诗三家义集疏》一书，给这一工作打上了一个句号。三家《诗》辑佚学促进了清代今文《诗经》学的发展。道光年间的魏源，利用前人的辑佚成果，撰成《诗古微》一书，就是清代今文《诗经》学的一部发挥微言大义、宣扬托古改制的代表性著作。

清代后期复兴的今文经学成了清末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，并与反对维新的保守的古文经学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但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后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后期今文经学派便渐趋式微，他们的学说的影响也越来越小。今文学派最后的大师皮锡瑞所著的《经学历史》、《诗经通论》等书，已经不讨论现实问题，不参与政治争论，而成为所谓纯今文学著作了。从此，中国经学的《诗经》学便走向了没落。

【三】

从上面我们对《中国《诗经》学发展历史的简略回顾可以看出，经学的《诗经》学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，都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，都是紧密联系着当时的政治现实，并为当时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斗争服务的。这一点今文《诗经》学表现得尤为突出。至于统治者怎样把《诗经》作为伦理教化的工具，我们只需向读者举出《韩

诗外传》这部书就足以说明问题了。这部书中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、忠孝节烈、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等一系列伦理观念，每一条都是引《诗》为证来加以说明的。

因此，有人批评中国古代的《诗经》学是“封建说教”。但如果我们以此为借口而将中国古代的《诗经》学全盘否定，那就错了。这是因为，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《诗经》研究中，对《诗经》的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名物、校勘、辑佚，乃至诗的背景和诗义的解释方面，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成果和大量有价值的资料，可为今人所利用，或值得今人借鉴，从而使今人对《诗经》的阅读理解和研究有所依傍。否则，《诗经》对于今人，其中的绝大部分诗篇，都无异于天书，不知其所云，而今天的《诗经》研究，也将在黑暗中摸索。再说，古人利用《诗经》所进行的说教，固然有许多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東西，但其中也有不少合理的因素，能够启发今人深思，给今人以教益。当然，我们不赞成今人再像古人那样对《诗经》作经学的研究，而主张用科学的方法，对它进行文学的、社会学的或历史学的研究，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，今人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

这本小书，选择了《诗经》中的四十篇诗（有几篇较长的诗只是节选了其中足以表达诗义的若干章），并通过“述评”，利用古代经学家对这些诗的诗义的解说，结合我本人对诗义的理解，来探讨一下《诗经》和古代经学家的诗说，对今人所可能有的启发和借鉴意义。这种写法只是一种尝试，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。

当然，读者如果想了解《诗经》和古代的《诗经》学，并